

## 第九章 最后的漫漫回滇路

师长辱蒙特遇，引为腹心，虽冒万险绝无退志，武侯有言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师长窃心焉好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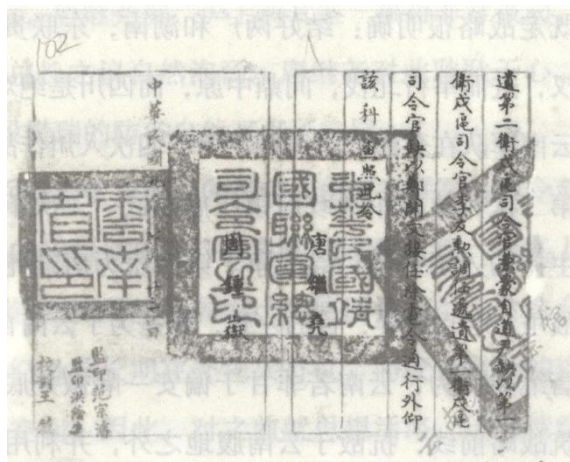
——转引自《郑开文 1919 年 7 月由韶关致唐继尧密电》

### 第一节 云树漫忘归倦鸟，渔矶犹望起飞熊。

处理完驻粤滇军的事情，郑开文回到昆明，鉴于郑开文此次在驻粤滇军分裂事件中所表现出的忠诚和智勇以及军人操守的品质，唐继尧已经不能将郑开文放在他的权力中心之外了。1920 年 6 月 1 日，唐继尧通电解除自己云南督军职务，以三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保卫地方，收束军队”，称：

夫欧战告终，人心厌乱，群方趋重民治，以恢复和平，而吾国乃日事同室操戈，以自受废灭。推原祸始，皆由督军制为阶之厉。今既和议之成，尚难预定，而海内汹汹，傲焉不可终日，此时惟有即行废督裁兵，为曲突徙薪之计。继尧遭国多故，忝握军符，既睹建国之坦途，尚复何心于权位，实行废督，请从尧始。兹已于六月一日即行解除云南督军职务，云南督军一职即于是日废除，所有全省军权，划为三卫戍区域，由卫戍司令官分别担任。至全省民政事宜，当由省长主持办理。继尧既以联军总司令名义，保卫地方，收束所部队伍，以免兵冗饷繁，贻国家以巨忧。一俟裁兵事竣，即当解甲归农，退安田里。至督军制度，积成藩镇割据之遗风，阻碍平民政治之实现，欲谋废此弊制，举国早有同情。所望当局诸公，为铜山洛钟之应，为国自损，当不后人。

继尧首倡实行，实非徒为洁身计，多更就力量所能及之范围以内，贯彻此旨，力促其成。其有拥兵自卫，抗此主张者，则是自便私图，不恤国脉，愿与同志共弃之。敬布悃忱，尚祈亮察。<sup>[1]</sup>



郑开文调任云南陆军第一卫戍区司令官的档案材料（云南省档案馆提供）

唐继尧废督裁兵有两个含义：一、拟将云南全省划分为三个卫戍区，每区设司令一人，废督后不设总司令，意在令那些日益成长壮大的部下失去争夺目标。二、在倒熊（克武）护法完成后，四川也仿照此例，不设督军，由三省联军总司令节制各卫戍区司令，形成滇、黔、川三省军事一

盘棋。6月21日，贵州刘显世也通电解除自己贵州督军职务，以三省联军副总司令的名义“保卫”地方治安。此时，唐继尧任命李友勋、郑开文、何海清为第一至第三卫戍区司令，接着又将郑开文调任云南第一卫戍区司令，成为唐继尧权力核心同进共退之人。

此期间，四川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本的原因是西南与北方集团的矛盾。段祺瑞始终不放心的就是西南数省，他宣称武力统一中国的主要矛头对准的就是在这一地区兵势最强也最有行动决心和能力而且软硬不吃的唐继尧。段对唐在5月份通电支持黎元洪，不满意骄横跋扈的北洋集团现时推行的独裁政策，称“只知拥卫共和，效忠民国”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说到底，唐继尧就是扎在他心上的一根硬刺，早晚得将之“拔除”。唐继尧自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采取的方针就是针锋相对，他的既定战略很明确：结好两广和湖南，东联贵州，北控四川，寻机东下武汉，进而举行北伐，问鼎中原，而四川是绝对必争的焦点。辛亥革命后，云南军队在蔡锷、唐继尧主持下四次入川作战：第一次为帮助四川光复。第二次为执行中央政府镇压熊克武“二次革命”的任务。第三次是蔡锷主持的入川护国讨袁战争。第四次为唐继尧护法讨伐刘存厚、吴光新的战争。名目各异，目的一致，皆是为了云南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蔡锷、唐继尧认为，云南若非甘于偏安一隅做井底之蛙，就得先控制四川，构筑战略前线，抗敌于云南腹地之外，并利用天府之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财富，壮大自己，进而举军北伐，直捣幽燕，清除乱源，统一全国，建立一个黄种人的亚洲强国，与欧美列强相抗衡。通过护国战争，云、贵、川已经基本连成一体，若非野心勃勃的刘存厚半途搅局，若非私心太甚的戴戡翻云覆雨，若非罗佩金督川时的系列判断失误和处置连续失当，西南的形势不会像如今这般被动。

虽然形势显得扑朔迷离，但其中并不乏规律性的东西，那就是涉事各方在攸关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皆不肯让步。护国战争之后，唐继尧毅然撤销护国军军务院时曾经得到消息，北京有推戴自己遥领副总统和参谋总长之议，唐继尧信以为真。与此同时，一件倒卖鸦片的案子却让他付出了“天真”的代价。原来，他手下人为了筹集办报和运动议员选举所需要的经费，曾秘密运输贰万两在云南禁烟期间查收的烟土（鸦片）意图到上海出售。这批鸦片在上海英租界的孟渊大旅社被英国巡捕查获。此案其中虽然疑点甚多，但是报纸宣传的矛头却直指云南警察厅长、云南军事代表唐继禹和云南赴北京出席国会会议的政治代表袁嘉谷、王九龄、张耀曾，而这些人皆被认为是唐继尧的心腹。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对查办此事的态度格外地认真，北京检察总署一度向全国发出了对唐继禹和袁嘉谷的通缉令，其用意相当明白，即便不能就此打倒令他十分讨厌的唐继尧，也要让他因此丑闻而身败名裂。案发后，唐继尧被“沪上鸦片案”搞得非常被动，传说中的遥领副总统和参谋总长之议自然泡汤。唐继尧对此耿耿于心，很长一段时间不能释怀，对段祺瑞的防备自然又多了一层。

同时，唐继尧“废督裁兵、联省自治”的策略，由三省联军总司令节制各卫戍区司令官，各个卫戍区司令掌管各省各地的军事实权，事实上造成顾品珍等在外作战的将领回滇无望的局面。即便回滇，也无什么合适的位置来安排，意味着他们必须长期在外领兵打仗，而废督裁兵的推行又无疑压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因此，对之前就思想活络、厌战情绪蔓延的将领们产生了巨大冲击。

1918年“重庆联军会议”之后，唐继尧与熊克武在《三省同盟计划书》中关于由联军统筹管

辖四川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熊克武认为云南方面欲以靖国护法的名义，永久控制四川，所以不予合作。唐继尧也渐萌倒熊之意，而心中对执着于靖国北伐的唐继尧已有不满之意的顾品珍却主张拥熊和川。据有战场优势的顾品珍一度与熊克武私下之约主动放弃简阳，事后又通电宣布与唐继尧脱离关系，然后故意率部一路放弃资阳、资中、内江，退向川南隆昌、富顺一带。唐继尧对顾品珍连电严词训斥，限期反攻，否则将临阵易将、军法从事，顾品珍无奈，只得重新进攻。7月，熊克武在滇、川、黔军的夹攻下败退川北山区。

错综复杂的格局还在于孙中山先生的北伐大计因熊克武阻止而屡行不果，川、滇、黔护法北上的局面无法打开，从而发动四川国民党人杨庶堪、吕超、石青阳与滇黔军一道共同倒熊。四川于是形成两派，一派为杨庶堪、吕超、石青阳所部与滇黔军，一派为熊克武、刘湘所部。前者以倒熊护法为号召，后者则高呼驱滇靖川、统一四川、川人治川的口号。

1920年6月间，在上海、广州的国会议员纷纷向昆明进发，李烈钧奉孙中山之命也赶到昆明与唐继尧接洽组织新的护法军政府。7月7日，到滇议员们举行了两院联合会，议决取消岑春煊的职务，补选刘显世为总裁。由于云南交通极不便利，7月15日，唐继尧、李烈钧与旧国会副议长褚辅成等举行会议，决定将召开国会和护法军政府移迁到交通较为方便的重庆进行。唐继尧电请孙中山及唐绍仪、伍廷芳早日启程赴渝。

孙、伍等正整装待发，四川的战场形势却发生了逆转。在川北山区一时无从可想的熊克武、刘湘在情急之下转而求助于在陕西汉中日夜思归、此时已经隶属北洋政府的刘存厚。对当初被唐继尧赶出四川一直耿耿于怀的刘师长，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翻身的机会。于是，熊、刘在苍溪举行会议，结成同盟，组织靖川军，在北洋军的支持下，大举反攻。面对卷土重来的川军，滇军虽将士骁勇，但主帅顾品珍却无坚决之战心，加之盟军内部因意见不合产生分歧，黔军撤离，川军倒戈，结果可想而知。

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四川的形势已经不妙，唐继尧却将不少心思和精力放在如何在昆明建立一所私立综合大学上。他自信四川的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就如同前几次一样，大不了在紧急关头自己亲自出马，将所有事情一锤子搞定。而教育为国脉所关，治滇要图，且“教育，强国之基础也，故欲复兴中国，须自教育人手”。西南之大，岂能没有一所高等学府以成就完全人才！唐继尧为自己要办的大学定调：这所西南第一的高等学府不仅为云南或者西南，并要为所有“东亚学生研究学术、昌明文化”提供方便与条件。其宗旨为“发扬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造就专才”。他亲自组织了大学筹备处，地点设在昆明翠湖的水月轩，由负责云南财政的王九龄和云南第一批留美硕士董泽主持。他致函王、董：“拟办私立大学一所，名曰东陆大学……应设正校长一职，勉由继尧抗颜担任，而兹事体大，端绪繁多，相应延聘竹村（王九龄）先生为副校长，雨苍（董泽）先生为教育长，以资襄助。”唐继尧为建校之事前后张罗，忙得不亦乐乎，几近痴迷。直到9月初才听到一些关于顾品珍将有异动的风声。10月2日，顾品珍致电唐继尧，请唐“毅然止戈”，从此“川滇和平相处”。如果唐不肯接受，他自请“先释兵权，不辞而行”。此举一出，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然而北洋政府的喝彩却是额外的高扬，时任北洋总理靳云鹏对此大加赞赏，致电顾品珍，誉之为“仗义丈夫，血诚男子”，希望他将来有机会到北京，介绍他与北方朋友见面。

10月8日，与唐公比较贴心的第二军军长赵又新在泸州战死，灵柩由杨森令人护送回滇，唐

继尧对此万分痛心。收拾残局将滇军第二军余部全归顾品珍的第一军统辖，而顾品珍在悉数领到北洋政府先前答应拨给的25万元开拔费后，启程回滇倒唐。11月中旬，率领部众一口气退到贵州毕节后，顾品珍决定等一等，看一看，不敢直接杀回老家倒唐。顾品珍对唐继尧实在太熟悉了，心里存着不少顾虑，他是见识过唐继尧是如何收拾老同学刘存厚的，而他与刘存厚同样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班同学。

## 第二节 靖国联军警卫军司令官郑开文与驻军宣威

鉴于情况紧急，到了“紧急关头自己亲自出马，将所有事情一锤子搞定”的时刻，唐继尧再次入川作战势在必行。出于宣传的目的，唐继尧连篇累牍地发表谈话，声明再次入川的策略、方针。义声报载唐联帅将移节赴川对各界之谈话：“赴川之理由：此次赴川完全系为解决大局、收束军队、息事宁人起见，原无何项穷兵黩武之野心。月来，滇黔曾联合实行对于时局有所主张（指废督裁兵，联省自治）。近北方各省区要人复电颇表赞同，和议极形接近。此后解决大局，约束军队，均非亲自赴川不可。顾外间有说到川组织军政府或联军总司令部者，此不过因南北议和，不能无对峙之机关。即有其事，亦系促和一种手段，并非完全极端主张武力主义，用兵到底。”

其实，从1920年9月起，唐继尧就为地区和全国变幻莫测的形势变化做了准备，再次赴川的各方面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除军事力量调配，军饷武器的准备外，唐继尧重新组建了自己的警卫部队，改组警卫团为靖国联军警卫军，下属四个警卫团，人员、装备等都远远优于普通滇军旅团的规模。在选择警卫军当家人时，唐继尧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郑开文充任警卫军司令官，替代了原警卫团司令唐继虞的职务。孔子在谈到交友分四个层次“可与共学，可与适道，可与立，可与权”，其中最难得的是“可与权”。郑开文之前担任云南第一卫戍区司令，就担负着拱卫昆明的重任，而唐继尧再次调任郑开文为靖国联军警卫军司令官，实际上就是将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交给了对方，这不能不说，郑与唐的密切合作关系达到休戚与共的地步。

郑开文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即着手整顿警卫军的军纪。当时的云南《义声报》报道云：

九月十三日午前十时，靖国联军警卫军司令部召集所属部队上尉以上军官会议。郑司令训词于整顿警卫军前途之关系极为重大，兹特录登其后：本司令官奉联帅命令，膺兹口口责任所在，不得不竭其驽骀，勉尽厥职，以达我联帅整军经武、护法救国之目的。今值本部成立伊始，特集合各官长概述一切，以资整顿。夫警卫军与其他项军队不同，其责之重且大，一以保障联军政府；一以维持地方治安。若不切实精练，何足以当此巨任。况此次随节赴川，联军、各省军队粹集于渝，我警卫军居最重要地位，于观瞻上、实际上均有莫大关系。[2]

同时，唐继尧命令靖国联军警卫军先期出发至滇东宣威，以为唐继尧再次入川作战的先头部队。义声报1920年10月21日载“警卫军出发之布告”：

此次帅座出发，沿途经过地方，所有市民人等必各安静如常，不得妄生谣喙，更勿妄事惊惶。须知护法宗旨原为救溺拯亡。随节警卫部队几经告诫周详，各守军纪风纪事，履不越周。行入市场购买食物均照市价平偿，及到宿营地点，不许擅入民房。如有不遵约束，胆敢恃霸强梁，准其扭禀来部，立即严处刑章。本部言出法行。所以保持善良。特此成为布告，期各凜遵毋忘。司令

官郑开文

1920年11月16日起，云南《义声报》连载随军记者的通讯《自省会至马龙之纪事》，记载郑开文率警卫军从省城昆明至马龙县的行军轶事，云：

余于十月十七日随警卫司令出发北征，是夜宿大板桥。

……（第四天）十一时至白塔铺，昨夜预定本于此休息午膳，至则厨司、伙夫等均未在此，因步出郊外与司令官席草而坐，谈及今日军队习气，司令官疾首蹙额，以精神缺乏为虑，因言警卫军为军队模范，此后誓从根本整顿，以祛积习。乃复进行至黄土坡休息，始知厨司等以白塔铺无米可购，就此为炊，故移地点。膳后，司令官因感于日间野外之言，集合大小军官，严加训诫，告以军人天职，示以整顿方法，即军风、饷纪及精神之振刷，命令之服从尤为注意，语长不及尔尔，训诫毕，业已九时，因次日道长，遂各安寝。<sup>[3]</sup>

由此可见，郑开文随时随地注重军队纪律的培养，可谓用心之细，点点滴滴，无孔不入。跻身于铁血行伍之中，以人类最为残酷的战争为职业的军人，想在战场上克敌制胜，你就必须在平时就锻炼成为一支渴望立功受勋的虎狼之师，培养出一支言行令止的威猛之旅，才能披坚执锐，攻城略地，完成军人的神圣使命和担当，获得只有军人才能得到的特殊荣誉。

《义声报》的《随军通讯》（四）还告诉我们后代这样一件事：

……二十二日，驻县休息，司令官疾（病）虽小愈而精神未及恢复。早膳后，偕友闲步至一农家，略询地方政况。始知大兵出发，民之苦于封马者，实惨不忍闻。县吏以封马事责成法警，使由各路勒封。法警出城查民间之有畜马者，不问其为驮马、骑马，勒牵入城。私以厚贿则放释使去。仍复于途中要勒索贿。有畜一马即封即释，旋释旋封至五、六次不止者，往往封至数次，其贿赂之额超过马值数倍；若不行贿，则将马牵来（关）闭于空房之中，水草不与，因而渴瘦饥毙者不可胜数。其司法警长与法警通同索贿。闻此次封马，由西北路一转即得贿六百余元，他路可知矣。至军队到时需马运驮，则以其关闭之马搪塞。此次司令部请其雇马，彼云预封有二十只，使人觇视，竟皆饥卧不起，无一可用者。呜呼，家畜饥殍，纵以噬民，民其不为鱼肉者几何。最可痛恨者，署前某姓，家畜二骡极壮健可用，以其女为司法警长所私，竟未被封。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种种怪象，实难缕指。其在外爪牙则为曹某、张某，身为团绅子充法警，表里为奸，无恶不作。其他军用粮秣柴炭等则由民间挨户派出，除米给价外，余者皆按保科送，不给分文，由团保转发军队，所得值则尽归中饱（私囊）。以故，民苦苛扰而团绅以之致富。种种苛虐，闻之发竖。想虽不犹过激之言，而切肤之痛，在彼老农身亲受之，未必尽皆子虚，呜呼。自出发以来，司令官对于沿途人民惕惕，唯恐有伤（于民），屡次集合各队官兵，剴切告诫，买卖务极公平，毫毛必须备价。以故，师行所至，四民安堵，而孰意地方官绅联络沟通，从中渔利，使民有捐输之苦，转运之劳。公家给钱人民不得沾其实利，向非今日，休息地方疾苦从何以知。此种情弊，他县亦不免，然不至如是不堪也。闻老农言，实怆余怀。<sup>[4]</sup>

郑开文率靖国联军驻军宣威的情况，见诸当时云南《义声报》随军记者的后续报道。《警卫军驻宣威之文告》：

警卫军驻宣威情形以见本报累次通信，兹复接有郑司令维持军纪之布告及令各队来往公文毋得省略，改值星为值周等文，照录如后。

维持军纪之布告：靖国联军警卫军司令部布告：照得大兵驻在地，往往兵民相杂处，若不及早申禁令，难免不兢相欺侮，兹特明谕，尔兵民务各守业安本分，兵不得擅入民家，民不得杂与军相混，倘敢杂聚相赌博，抑或引诱相淫酗兵，由本部重惩罚，民送县令加管押，兵民各自有区别。本部时派有密查至，若买卖相交易，彼此尤贵守公平，民不得高抬市价；兵不得短折钱文。须知兵民原一体主客，务各申感情，兵由本部加约束，民由县令示详明。本部言出法朗，随察觉，惩办罚匪轻，自经明白晓喻后，兵民其切切凜遵。<sup>[5]</sup>

郑开文把军队日常事务与国家体制联系起来，规范基层部队的行文，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1920年10月底，郑开文率警卫军驻军云南宣威，曾发布系列《警卫军驻宣威之文告》，其中一则刊载于云南《义声报》1920年11月16日，就是关于部队来往公文的规范《令各队来往公文之毋得省略及改值星为值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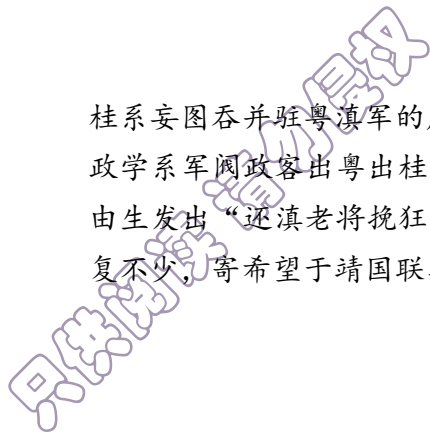
查军语以直截了当为佳，然尝见有奢省略而反误事机者。各部队公文函电写步兵第二营、第三营是明明只有两营，倘将第字省略，仅写二营、三营，则二加三岂不共有五营乎。平时相习成风，未尝不可，及至临战难免部位省略所误。因小失大，貽患何堪设想。自经通令以后，凡写军师、旅、团、营、连、排各队号均须冠第字于数目之上，以免貽误。又，民国改用阳历，以日月水火木金土各罗列于日字之下，周而复始，故以此七日称为一周，乃竟有相沿而称星期者，且有以日曜日为星期日，以月、火水木金土六曜日而称为星期一、星期二，及三、四、五、六者。果同所据而云。然假令将一、二、三、四、五、六各数字冠于星期两字之上，又岂不相悬别。甚至有沿用教门习惯而改称星期为礼拜者，尤属谬妄已极。况我民国人应遵用民国历，此一定不移之理。以后，着一律将值星改为值周，并将每周照民国阳历改称日曜、月曜、火曜、水曜、木曜、金曜、土曜。以重国体而杜覬觎。<sup>[6]</sup>

我们从小学起都要轮流值日，班干部轮流值周，这个“值日”“值周”的说法是不是从郑开文提议开始的，没有人考证过。不过，郑先生居然把习以为常的日期变相说法上升到有关军队事务和关系到国体及防止西方教会文化的浸染，杜绝西方国家的覬觎，倒是闻所未闻。可见，郑开文对培养军人的用心良苦至任何细节都不放过的地步，以及高度的政治敏感，把新兴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的领导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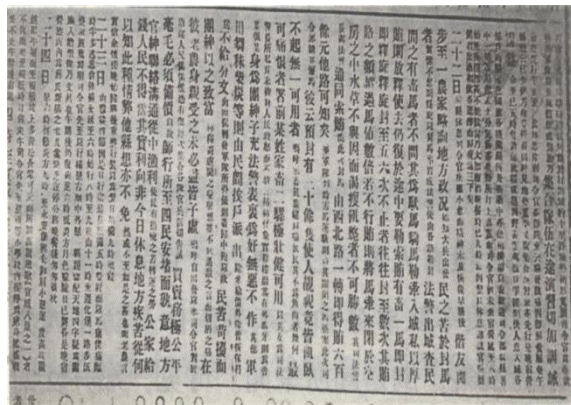
在宣威驻军的短暂时期，军务之暇，郑开文慕名到宣威名胜松鹤寺远足。沿曲曲弯弯的山路攀岩而上，山色青黛，山风拂面，好不清凉宜人。他忍不住技痒，信笔由来写下一副对联：

石龙岭信步游来，帐尘世迁流，空遗真仙伏古刹。  
磻大天一举打破，看珠帘倒卷，还滇老将挽狂澜。

石龙岭、磻大天均是云南省宣威市东山景区的风光名胜。“珠帘倒卷”是松鹤寺前一处瀑布奔腾而下，泉水不是跌落深潭而是被上升气流吹向山顶的景象，堪称奇特。此时此刻，郑开文触景生情，联想到广东驻粤滇军分裂事件中，由于自己的坚忍不拔和坚守革命军人的志操，竭力抗拒



桂系妄图吞并驻粤滇军的威迫，引发革命势力重新集结在孙中山的旗帜下，驱逐不可一世的桂系、政学系军阀政客出粤出桂的大风潮，从此孙中山领导的护法事业走出低谷，赢得了转折机会，不由生发出“还滇老将挽狂澜”的豪迈断想。可见，他此时的心情不错，驻粤滇军分裂的创痛也平复不少，寄希望于靖国联军能够顺利北伐护法，直捣燕京，实现护法救国的理想。



云南《义声报》连载随军记者的通讯（郑开文率靖国联军警卫军）《自省会至马龙之纪事》

由此看来，郑开文颇有些古代士大夫的气质，始终秉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信念。在大是大非的气节上，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正气凛然。上马打天下，驰骋沙场，为国效力，敢于担当道义；下马治天下，为黎民百姓维护一方的安宁与富足。在个人的修身养性方面，写诗作赋、风水玄黄，都很有见地。他自述：“风水一端关系身家甚重，余竭尽心力揣摩有年，跋涉山川，穷极艰苦，迭经高明指点，始觉稍有会心”，可以窥见他的内心世界是充实、丰富的。郑开文敬畏自然，感恩生命，总觉得在个人生命的旅程中，应该让自己活得有声有色，也应该为后人留下点什么，才能对得起天理良心。郑开文为官清廉，常常以“做大事，不做大官”自勉，对官场上的贪污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他在撰修郑氏家谱时告诫后人：“莫隳先绪通德，愈光勉之、望之，警惕毋忘。”这些朴素的思想都源于他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感恩。他敬畏自然、感恩生命的方式亦很简单明了：对已经拥有的要在意、珍惜；对别人（包括自然界）给予的要感恩、要回报，对世事凉炎的境遇要平静、消融。

### 第三节 唐继尧被绌以及二次回滇事变

谁知，非常时期，平静安宁的时光总是很短暂的。1920年11月，四川倒熊派彻底战败，北洋势力乘虚而入，逐渐将顾品珍笼入己方阵营。唐继尧之前曾经得罪过、如今已经投北的滇军将领曲某某、李某某、张某某和政学系大将李某某等纷纷出马，鼓动顾品珍回滇倒唐，并积极帮助顾品珍向北洋政府联系开拔费。川滇内江的主事者熊克武通过自己手下的师长、顾品珍的结拜兄弟但懋辛，在确定顾品珍的真实意图后非常高兴，经过几次秘密会商，他毫不犹豫地顾品珍提供了30万元军饷及所需要之枪械弹药，实力支持顾品珍回滇倒唐。

由于顾品珍的行动比较隐蔽，表面工作做得不错。唐继尧隐隐约约感到这其中有一些蹊跷，然而又拿不准。作为义结金兰的拜把兄弟，唐继尧对顾品珍一直是比较信任的，亦不敢相信顾品珍真能背叛他。设布在顾品珍内部的两员心腹爱将邓泰中、杨蓁，正替他监视着顾品珍的一举一动，他们向联帅提供的“顾（品珍）目前比较可靠”的消息也相当程度解除了唐的戒心，觉得自

己还是能够驾驭形势的。殊不知唯恐顾品珍不敢动手而反复鼓动顾品珍的正是邓、杨二人。他们对唐继尧坚持川战消耗滇军力量早就厌烦已极，对深陷种种困难的滇军去硬性主导“北伐”“护法”更是没有兴趣。此次滇军在四川“倒熊”战败，部队被缩编，军官降职或编余，邓泰中、杨蓁与一群高级军官即处于等待重新安排工作的状态，大家心中自然相当不满。更何况唐继尧治军严肃，诸将皆惧怕一向严厉的唐公以军法相绳，不得不采取主动出击以避祸。但是，这些高级军官觉得自己所具备的力量还是不够，于是聚合到顾品珍这面大旗下。然而，作为他们依靠的顾总司令，却对武力倒唐根本没有多少把握，省城昆明驻有重兵人所皆知，他不敢贸然高张大旗公开进军，毕竟手下只有三个团的兵力，而那边的军力数倍于己。

唐继尧派省长周钟岳前往贵州毕节犒劳军队，借此了解顾品珍的动向，探其底线。顾品珍对此当然心知肚明，他向周老先生反复陈述自己之前为何通电宣布与唐继尧脱离关系，然后率部下退向川南的原因。他声称一切皆为情势所迫，本人绝无任何背叛唐公之意，并表示自己将始终拥戴唐公。之后，顾品珍立即通电宣誓就任唐继尧委任的云南东防督办一职，并马上着手改编部队，并移驻云南宣威。一个月后，周老先生返回昆明，向唐继尧汇报了顾品珍的情况，周钟岳总结有十大可疑点，但是自信的唐继尧听后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对老同学兼结拜兄弟顾品珍是了解的，意见肯定是会有的，且无疑不少，但“毕竟是内部一家人，都可以从长计议”。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唐继尧电示郑开文将靖国联军警卫军撤回昆明，在报纸上刊登撤去布置在沿途密探的指令，并在昆明代设东防督办行署。熟读四书五经的滇军将领们，自然通晓“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典故，唐越是表现得这样敞开胸怀，心存余虑的将领们警惕性也就越高涨。

顾品珍在宣威等待观望之际，一个机会陡然降临。1921年1月27日，与顾品珍部图谋回滇“倒唐”完全无关的滇军第八军军长叶荃，以“欠饷”为名发动兵变，从寻甸率军向昆明进发。在接到叶部一名旅长的紧急报告后，唐继尧马上组织重兵进行堵截。叶部力量单薄不支，忽而退去，唐军则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滇南。此时省垣空虚，等待时机而发的顾品珍当然不能放弃这样的绝好机会，紧急率部从宣威出发，星夜兼程，直趋昆明，于2月6日抵达寻甸，省城在望。唐继尧闻讯大惊，连夜开会布置迎击。在会上，与会军官们一致谴责顾品珍，认为其在川作战不力，丧师失地，致使滇军出师武汉的计划横受打击，已罪无可逭。况受敌军运动，自由撤防回滇扰乱，若不以武力制裁，不唯开武力犯上作乱之风，致滇省军纪堕地，且护法策源地云南此后恐无宁日，一致决定以武力讨伐。会后的军事部署为：一、飞电至滇南调集援军。二、由郑开文率警卫军担任中路，田钟谷旅担任左路，杨蓁旅担任右路，立即开赴大板桥一线阻击顾军。就在一切都似乎问题不大之时，情势却急转直下。杨蓁旅长突然通电辞去右路指挥一职，宣布加入顾品珍的倒唐军。紧接着，由邓泰中领衔，20余名滇军旅级军官联名通电《忠告唐继尧请其暂避贤路》，给予唐继尧重重一击。唐继尧虽然知道顾品珍回滇这个事情绝不简单，但是却没有料到事态会发展得这么复杂，先前以为只是顾军一支，可以压服，然而如今却俨然成两大阵营！是战，是和，一时难以抉择。若是坚持开战，双方势均力敌，亦有胜机。但滇军大规模内战，桑梓遭灾，民众受祸，后果不堪设想。若战火烽连，导致护国、护法盛名的昆明糜烂，一生名节胜负皆毁，又何以见谅于三迤父老。唐继尧思前想后，知道自己这些年坚持护国、护法的立场，不得不连年征战，已经得罪了不少人，平时大家皆隐忍不发，但此时矛盾集中爆发，已经无法调和。如果继续留在

云南，估计大家都不好做，不免陷入系列尴尬之中。虽然对方仍然一口一个“唐公”地叫得十分恭敬，似乎还有商量的余地，但是唐继尧还是决定洁身下野，带领家人离开云南。1921年2月8日，农历辛酉年初一凌晨，唐继尧率唐继虞、郑开文、王九龄、由云龙、陈维庚、林丽山和外籍军事顾问、日本驻云南领事馆武官山县初男等十余官员及其家属，坐火车经宜良到蒙自。2月16日，在法国驻越南当局派出的军警监护下乘火车离开滇境，经越南海防流亡香港。

唐继尧经河内、海防改乘轮船抵达香港之前的3月4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三总裁联名电请唐继尧到广州共商大计。因为离滇入越之时，唐继尧曾示意军政府，自己愿意到广州就任总裁一职，但当时孙中山的态度并不明朗，令心高气傲的唐继尧很是郁闷了一段时间。他私下揣测原因大概有二：一是自己过去表现得各自为政，比较目中无人。二是自己如今已成为失去地盘的流亡之人，如果广州方面亲近自己则会疏远顾品珍，而那才是孙先生眼中有实力、有地盘而因此值得重视的人物。不意如今竟然有联名电来，自然欣喜万分，立即率众赴穗。国民党重量级人物胡汉民、汪精卫、张继等已经先期抵达车站迎候，接到唐继尧后，一行人即乘专列到达广州。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三总裁及粤中要人齐至车站迎接，使处于落难状态的唐继尧禁不住格外感动。当天晚上，军政府举行宴会为唐继尧洗尘，为了对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唐秀才表示敬重，主持宴会的孙中山先生很不寻常地特意穿上了长衫和马褂。他对看上去有些不自在的唐继尧分外热情地道：“你来了，与我合作，我有办法。”孙中山在欢迎宴会上致辞道：“冀帅退出云南，不但不是失败，而且是很大的成功。现在全国当权人物最缺少的就是忍让精神，冀帅不把云南视作私产，部下要干，就让他们去干，正是忍让精神的良好开端。我们满饮一杯为冀帅贺！”而汪精卫的一番话则说得让唐继尧更加心情荡漾：“我对冀帅的看法，今昔有所不同。以前我认为冀帅是一个伟大人物，可是今天看起来，他就更伟大了。”与孙中山的情谊融洽令唐继尧眼前展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在游香江时所作之诗，极能代表他此刻的心情：春梦十年一觉醒，微风拂海浪花轻。果然鸱化难为水，会有龙飞不染尘。铸舜陶尧新事业，侵天略地旧纷争。渡人渡我浑无解，义橹频来款人声。

之后，“孙唐携手”“孙唐合作”的标语和两人的画像一时间充斥于广州街头。3月12日，军政府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唐继尧。孙中山首先致欢迎词云：“唐公离滇来粤，不知者谓其失败，实则其大成功也。何谓成功，可分别言之：一、个人的；二、西南的；三、中华民国的。今之言愿牺牲权利而实纤芥必争者多矣，唐公当此变乱，有尽足反攻之兵力而不用，悄然引身而退，是真能牺牲权利为天下倡者，此个人之成功一也。唐公何为不反攻乎？盖以为继三省者，苟能率由旧章，则己之地位虽失，而护法主义尚在，何苦以争护法之故，使人民受祸耶！故唐公之地位虽去，而息事宁人之道德益彰，此个人之成功二也。二、西南有两势力，滇广正而桂陆邪。唐公十年以来，除帝制、护约法、拒苟和，大节凛然不变，为我人素开钦仰。然昔日治滇，未尝亲列中枢，面商大计。今军政府中，乃得唐公来规划一切，此西南之成功也。三、唐公现存之兵力，足以对外发展，且治军多年，诸多利赖。昔为云南独有之唐公，今后则为中华民国共有之唐公，此中华民国之大成功也。”唐继尧随后致答，将此次所以毅然离滇的原因做了简单陈述：不忍糜烂桑梓，不肯争权夺利，此次政变原系受人挑拨，久当自明。他表示：“承诸君之邀留奖勉，怦然悟今尚非偷闲之时，遂以决随诸君之后，以贯彻辛苦经营之护法事业。”

事后，唐继尧听知情人说，孙中山本来对邀请自己到广州并不热心，认为“莫赓有权有势时就不服从，现在失败了，也未必肯服从，即使服从也不起什么作用了”。之所以后来转变态度则是因为自己的云南同乡李华英给孙中山先生做了一通比较透彻的分析。李华英的意见是：“唐的可靠兵力还有数旅留在云南，顾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把唐的兵力调出来，只会引起顾的向心力，而不会引起离心力。这部分兵力调出来，就可以与粤军一道，两面进攻广西。广西问题若解决，军政府的威望就可以大大提高。这正是保卫广东和巩固革命势力的重要关键。”知道了这些幕后情况后，心高气傲的唐继尧感到了几丝不快，但他并未就此说什么。处于目前这种情势下的唐继尧又能说什么？他本来就比较了解孙中山的为人处世方法，不过还是表示理解：先生为事业奔波多年，眼看逝者如川水，却革命尚未成功，真的着急啊！唐继尧委婉地向朋友们表示自己在适当的时候可以离开广州到香港居住的想法，然而非常国会和军政府根据组织法考虑到“以军政府总裁法定人数至少有四人负责，始生效力”，唐继尧如果离开广州，将影响政务会议的合法性，于是由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三总裁出面挽留唐继尧定居广州，唐继尧答应考虑。

3月31日，唐继尧第一次出席了军政府政务会议。会上通过了任命顾品珍为云南总司令，卢焘为贵州总司令的议案。唐继尧对于总裁工作似乎渐上轨道，然而他却对导致自己流亡的原因一直不能释怀，每想到顾品珍就心中有气，这个老同学兼拜把兄弟简直把自己害惨了，一个威震天下、领袖西南的护国护法有名人物一时之间竟然背井离乡，变为敌人讥笑、友人怜悯的对象，这背后中箭的恶气如鲠在喉，如何咽得下去？虽然在公开场合他表现得非常大度，私下却愈来愈耿耿于怀。他不是不明白“无事便思有闲杂念头否，有事便思有粗浮意气否，得意便思有骄矜辞色否，失意便思有怨望情怀否。时时检点得到，从多入少，从有入无，才是学问的真消息”的训导，但就是不能“透关而得休歇”。每与亲信之人谈及顾品珍，唐继尧的口头禅就是：“不扑此獠，誓不为人。”他多次对人表示，无论谁主政云南自己皆同意，唯独顾品珍不行！

此时顾品珍因为滇省历年用兵，元气凋残，需要休养生息。遂宣布继续实行军民分治，整理内政，不问外事，在南北大局未明了之前，暂持沉默主义。与唐继尧执政时代不同的是，云南如今各道尹、县知事半数由曾经拥护顾品珍的军人担当，这显然是以公职为酬劳的结果。唐继尧对此非常担心，他清楚，这些武人多年征战在外，毫无理政经验，风狂雨急时也许还能立定，花繁柳密处却大多拨不开。一旦江山在手，民权在握，真不知道会做出什么随心所欲的鬼事情来，最后倒霉的只会是地方百姓。唐继尧对老朋友李宗黄说：“云南是我们的父母之邦，昆明又是我们的创业之地。民主以来，尽管天下滔滔，几经危难，但是我们总算保住了昆明，不曾使它遭到战火……离开时我下令各机关的主管，务必将财务公文，一应设施，完完整整地移交给顾品珍。之所以要这样做，目的就在于正告顾品珍他们，我退出昆明完全是为了保全地方百姓，请他们不要乱来……过一两年，我们再回来跟他见个高低。界时，还要请滇中父老慢慢地评断评断，看看究竟谁是谁非，谁善谁恶！”

然而，孙中山却不希望唐继尧身在粤省心在滇，更不赞同他一心向顾品珍寻仇。老先生既需要唐，也需要顾，他依然眷念曾经的总统之位，但该死的陈炯明却不肯合作，并暗中拆台。老先生对此异常愤怒，他曾经斩钉截铁地对人说，“革命工作需要两件东西，一件是权，一件是力。我今后干革命工作不要军人，不要假革命！我一定要做总统，做了总统我就有权和力了。我限陈炯

明在一个月内存足北伐军费二百万元，如果办不到，我拿对付莫荣新的手段对待他（指炮轰观音山）。别人骂我孙大炮，我就是大炮”。在与宋庆龄共同邀请唐继尧到粤秀楼赴自己的家庭晚宴时，孙中山凡杯酒下肚后曾推心置腹地对唐说：“吾频年劳瘁，行将老矣！……其赓先生年华鼎盛，功勋彪炳，信望孚而才识卓越，正是我理想中的继位人选。以我们的三民主义，以我们国民党，再加上你们勇敢善战的十万官兵，在一两年内，就可以犁庭扫穴，直捣幽燕，把北洋军阀摧陷廓清，一举厘平。然后，再拿我的建国方略，积极从事建设。我相信，在我二人手中，必能促使富强康乐的新中国得以实现，不审其赓先生高见以为如何？”孙中山先生一贯的个人魅力陡然展现，一时非常感动的唐继尧也正容敛色地回应道：“继尧学识经验极为浅薄，实不敢负此重责大任。但既承先生隆情高谊，属望殷切，今后自当竭尽所能，助先生一臂之力，庶几无负先生之嘱托。”不久，孙中山筹备援桂北伐，聘任唐继尧为滇、黔、桂联军总司令，率师驱逐桂系出广西。唐继尧欣然从命，派驻扎在湘、黔的滇军胡若愚、朱培德、杨益谦部入桂，攻克了桂林，军队扩大到两万多人。派驻扎在云南蒙自的李友勋、龙云部进兵广西，顺利攻克柳州，唐继尧任命龙云为柳州警备司令。李友勋和龙云遂以柳州为基地，积极发展拥唐的滇军势力，队伍扩大到一万人左右。

一时间，滇军在西南三省伸展了空间，似乎又恢复了元气。然而，军政府此时的形势正在慢慢发生变化，经过细心观察，唐继尧已经明了孙中山与陈炯明的矛盾已经发展到难以调和的境地。虽然孙中山曾经公开表示过：“我望竞存兄（陈炯明）为民国元年之克强（黄兴），为民国二年之英士（陈其美），我即以当时信托如克强、英士者信托之。”然而，孙中山的志向是统一全国，陈炯明则只图维持广东一省；孙中山力图趁势扩大，陈炯明则处处掣肘，于军权和财权上根本不予通融，其间暗潮涌动，风波迭起。唐继尧感觉到，如此发展下去，孙、陈双方终有关系溃决、彻底翻脸的一天。自己夹在中间，首先难做人，其次难做事！看来广东亦非自己的久留之地。

流亡香港、广东的日子，郑开文是唯一相伴相随唐继尧的士官生同学，参与、筹划了唐继尧在香港、广东、广西的所有活动，成为唐继尧在政治、军事、外交事务的主心骨和左膀右臂。郑开文对战友、对朋友向来是忠诚敦厚的，没有栖栖惶惶的急功近利之心，从来不为自己的官职大小而计较，也不为钱银的多寡而分神，事功而不据，深得战友、朋友们的敬重，许多重要的大事交付他办理会很放心。他利用自己长期在广东工作中积攒的人脉资源，牵线搭桥，奔走呼号，谋取唐在政治、道义上的主动权。或坐镇香港运筹帷幄；或穿梭于两粤的滇籍部队，纠结队伍，笼络人心；或罗掘衣袋，东借西贷地拼凑巨额饷糈。这一切，由于郑开文的秉性和著著进行的工作方法，均极有成效，提升了唐继尧流亡政权的威望。

被人看重有时候也是件麻烦事。在昆明时，唐继尧让郑开文担任着诸多职务，忙碌劳累是本分，更多时候是游走在风口浪尖上，为唐继尧消弭冲突，挡箭饮弹。这些职务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曰护卫员：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云南第二卫戍区司令官、云南第一卫戍区司令官、靖国联军警卫军司令官。二曰救火员：云南都督府顾问官、参赞、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校长、云南清匪处参事、催收铁路局借款专员、云南锡业公司账务清查委员长、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靖国军第四军代理军长、靖国军第一军代理军长。唉，没有办法啊，哥不承担又有谁的仔肩能担。时间回溯到1927年2月6日，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等“四大天王”逼宫夺权，掌握军队大权的唐继虞、陈维庚等一千人马，竟是一筹莫展，把唐继尧活活气得吐血而亡。那一刻，唐继尧是否会

想起老哥哥郑开文在身边时，尽管周围险像环伺，危机四伏，有人挡着，自己仍可雪月风花、赋诗丹青的惬意时光？

有诗为证。唐继尧在二次回滇途中赋诗《壬戌元旦在柳州步郑参赞韵》曰：

扰攘频年任未终，疮痍不定慚元戎。  
乐忧有意分先后，造化无心问拙工。  
云树漫忘归倦鸟，渔矶犹望起飞熊。  
凯歌春酒香仍冽，共醉华山翠海中。<sup>[7]</sup>

这首诗写于1922年二次返滇途中，表现了唐继尧重整旗鼓、再掌滇政的决心，以及期许得到郑参赞鼎力相助的真挚感情。诗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由都交代清楚的。壬戌元旦即1922年1月1日，地点在广西柳州城，事由为步郑参赞韵。原韵者郑参赞为何人，参赞职务何意？某《唐继尧诗详注通释》是这样解释的，郑参赞：郑炳然，四川广安人。在柳州与唐继尧多有诗词唱和。参赞：在都督府参与协助军务的幕僚，并非外交官员。嗨，这显然是扯偏啦。郑开文，字炳然，云南通海人，时人常以“郑炳然”称之。唐继尧诗中既然提到郑参赞，即郑开文无疑。因为，郑开文于1919年6月担任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其部是支持广州护法军政府的重要军事力量，1919年10月被军政府任命为护法军政府大本营参赞。还可能因为，1912年元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郑开文被任命为临时政府参赞，协助黄兴筹建陆军部，并作为武官准备参加南北议和谈判。嗣因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亟待成立，调任郑开文为代理军学局局长。唐继尧自然熟知郑开文的经历，此处用“参赞”语，有和韵的需要，也有自嘲的意味。彼时唐继尧落拓在外，二次回滇的盘算还不能公诸众人（唐继尧于1922年2月20日才对外宣言率部回滇），只能以精神鼓动为主。诗中表达了期望郑开文辅助他，克服难关，重整旗鼓，成就再掌政权的大业，允诺凯歌高奏时，我们一起“共醉华山翠海中”。诗中的“飞熊”典故源于《武王伐纣平话》：西伯侯夜梦飞熊一只，来至殿下，周公解梦谓必得贤人，后果得贤人姜尚。当时姜尚正在渭水畔鱼矶垂钓，后因以“飞熊”指君主得贤的征兆，此处诗文喻指能扭转乾坤的杰出人才，显然是指原韵者——郑开文。

唐继尧1921年避难香港、广州，直到柳州召集旧部，谋划二次回滇，郑开文是唯一陪伴左右的老同学、曾歃血为盟的结义兄弟，回滇事件的参与、策划者。1921年12月16、21日长沙《大公报》载有：“12月3日，唐继尧由香港乘香山轮去广州。4日抵广州与伍廷芳、陈炯明、廖仲恺、汪精卫、张继会晤。下午1时偕郑开文、陈维庚等乘广三路汽车赴三水转轮船于5日抵梧州”，“唐继尧及其随员郑开文、陈维庚等，在黔军胡瑛所部一団护送下，是日（12月8日）赴柳州”等内容，均说明郑开文一路相随唐继尧，起到了唐继尧二次回滇的辅助、支撑的作用。有了上述的注释，意译此诗就是：国家连年纷乱，我们承担的护法救国任务还没有完成，中国大地却因战祸而满目疮痍、人民流离失所，使我感到万分惭愧。我俩抱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向，只要我们努力地奋斗，就无须去追问事业成败的天意如何。家乡的云树盼望我们这些倦游之鸟回去，我也期望你像姜子牙辅助周武王一样，帮助我扭转乾坤，重掌云南政权。届时，我们将共享凯歌、美酒的胜利喜悦，陶醉在五华山、翠湖的美好景色中。

《壬戌元日在柳州步郑参赞韵》是唐继尧与郑开文最后一首诗词唱和，按步某人诗韵的规律，

向对方表达感激、希望之情或赞美对方的高山流水的雅洁，是步韵唱和的常见手法，应该是他内心情感的含蓄表达。有趣的是，唐继尧邀约原韵者一起陶醉于五华山、翠湖，不是美景，而是喻指将与郑开文分享滇省权力的许诺，这是《唐继尧诗详注通释》作者所不能指点的背景和内涵。

但，郑开文是唐继尧寄予厚望的“飞熊”，陪伴他走过人生最为困顿的二次回滇之路，却不能与他“共醉华山翠海中”了。1922年2月12日，广西宜山县（今宜州市）怀远镇，为唐继尧二次回滇大军殿后的郑开文被土匪伏击，血洒沙场。唐继尧得知报信后，一度悲痛欲绝，月余饮食不进，可见他们之间的情意笃深。为了稳定军心，郑开文的名字仍然出现在回滇大军的各种文告、电文中，仍然是靖国军滇军第四军代理军长、靖国军滇军第一军代理军长，护佑唐继尧顺利进入昆明城，这是后话。

#### 第四节 郑开文在广西怀远遇难的真相

其他方面，自然就是唐继尧不愿意继续为他人做嫁妆了，是因为北伐这件事存在诸多问题：其一，没有陈炯明的鼎力支持，北伐军队的饷械无疑是非常成问题的。其二，他认为此刻“孙已不见容于陈”，自己夹在水火之间，唯有“无趣”二字可言。其三，陈炯明派人到香港与自己密商，如果在桂滇军回省，将倾力相助，给予滇军饷械接济。唐继尧非常明白陈炯明的意思，这个善于盘算的人无非是怕滇军与孙中山配合，造成自己的权力危机，而滇军离桂，他便可以在两广“事权统一”了。

唐继尧此时对龙云青眼有加，这个前靖国联军警卫军团长对于唐继尧暗中计划率部回滇反击顾品珍一事，态度十分积极。事情尚在酝酿过程中，他就从柳州拍来一个颇晓世故的电报请示问安，令经历了冰凉世事的老长官心中十分温暖，被认为是诸将领拥戴二次回滇的民意，更坚定了唐继尧的回滇信念。电文道：“……此次各代表到柳，辱蒙惠赐多珍，体念下情，无微不至，望风请领，铭感难忘。回滇大计，协老似固执己见，难得赞同。竹君处前接子嘉敬电，宪民宥电，均称：‘经营、团长以上秘议两次，与我一致决定，一月内开拔完毕’等语。曾经电呈钧座，未知得荷洞鉴否。但杨此举，是否出于真诚，抑或与我委蛇，其中具相，尚难悬揣。特派复初为代表，偕林、高、毛、李诸君，前往接洽，如果确无变迁，则在外各部队之联络，亦算圆满。前又苦无统筹之人，欲望各路司令商办，实属不易，是不能不望钧座之决行也。昨奉真电，粤军总攻龙州，我军应分兵攻取百色。防敌东窜一事，当时仓促电复，业已肃清，现龙州仍在战斗之中。云已将真电达李、杨、胡各司令，不知伊等能体钧座意旨，乘机移动否。近发杞、梗、俭、艳各电，想已达到。余容后详，肃叩勋安。旧部龙云谨呈。”显然，龙云的这番忠心耿耿的表达，被唐继尧认为是所有驻外滇军部队的民意，促使他加快了二次回滇的步伐。

对于研究1922年2月唐继尧二次回滇事件真相的学者来说，符昭骞先生的回忆录《唐继尧回滇讨伐顾品珍亲历记》和李友勋部参谋长李某以亲历者身份向粤报记者叙述的《李友勋遇害详记》，是最早的关于滇军二次回滇的资料，一时左右了后人对此事件真相的探讨。

## 【相关链接】

### 《唐继尧回滇讨伐顾品珍亲历记》

作者：符昭骞

……唐继尧对于回滇的准备已大致就绪，乃于1921年底，由港率其幕僚（唐继尧留港任后方联络和向滇省拥唐部队联系）秘密乘英国商船至梧州。赖粤军兵站第三分监李民雨之助，代征雇浅水电轮四艘，于是循浔江溯西江往潯州，然后折入柳江经武宣，象县向柳州进发。

在临行之前一晚，电轮上需要旗帜以壮声威，唐命我找缝衣店赶制红缎黑呢大帅旗，以应急用。唯时间太促，商人未肯承办，我随即向唐复命。值王九龄在座，向唐建议云：“制旗既来不及，不妨用白布书红字代替”。于是命我购妥白布及红色墨水备用，由王挥毫疾书“靖国联军总司令唐”等字样，写妥后派人下船悬挂停妥。不料当夜落了一阵大雨，翌晨登轮出发时，大家目击悬挂之唐字大旗，面目全非。唐字之一点及其余各处不甚变化，唯第二划之一横，其两端积墨较浓，经雨水溶化之后，便形为珠泪涟涟的两眼。众均讶其不祥，唐当然亦露不愉快之色。王九龄原来笃信佛教，且颇精于易理。启碇不久，唐却向王云：“竹村（王九龄字）卜一课试试看。”经王郑重其事地卜了片刻，其象下下，其附注又有：“未出军先损大将”一语，唐尤为之气沮。郑开文皱着眉头向大家说：“这是迷信的玩意儿，不必深信，我们来观赏江景吧。”时值冬天水涸滩多，且逆水行舟甚慢，而两岸峯峦重叠，红叶奇艳，唐、王、郑等乃赋诗取乐。我现仅记得唐咏有“无端平地起蛟龙，枯木逢秋叶更红”二句。舟行四日：计头日宿平南，次日宿武宣，第三日宿江口圩。船抵江口圩时，值黔军团长谷正伦驻防此地，列队相迎，并备有精美的晚餐三桌，坚挽唐等上岸赴宴，宾主开怀畅饮，至夜阑始散。翌日上午才抵柳州。

唐抵柳后，在道台衙门设靖国联军总司令行辕，并部署回滇军事。总部设立参谋、副官、机要三处，以田鍾谷为总参谋长。参谋处共分三部：第一部长高向春，第二部长毛鸿翔，第三部长李秉阳，各部参谋三五人。副官处以李永和为副官长兼理军需事宜，副官不足十人。机要处以白小松为处长，职员仅数人。其他各处暂不设立，好在工作较简，尚能应付裕如。

关于返滇路线及沿途宿营地的分配，因无军用地图，仅就邮政路线图按图上附记情况作出决定。其行军路线是以庆远（宜山）为起点，经怀远、得胜关、金城江、河池、东兰、凤山、凌云、西林至滇之广南为止，作战部署俟到广南后再依情况而定。军队编组原设三个军，军长内定为李友勋、胡若愚，郑开文（光杆无兵，仅有虚名）。每军辖二个梯团（梯团长一个是龙云，一个姓奚，忘其名），每梯团辖两个支队，每支队分为三个大队，大队分为三个中队（支队长我仅记得有孟友闻和朱旭，大队长仅记得卢汉及孙尔斌，其余因事隔多年，均已忘记）。唐在柳州逗留约一周，一面作回滇部署，一面等候部队集结。尔后唐又进驻宜山，筹备给养和征集民夫，并举行一次隆重的誓师及授旗（团旗即支队旗）典礼，召集一次较长时间的军事会议（好像两天），然后才督师西行。

滇军在宜山及其近郊集结者共约一万两千人左右。除李友勋、龙云、胡若愚三部以外，尚有滇，黔联军援桂第五路司令胡瑛所部在内，胡瑛原为黔军，但其本人乃滇省迤西人，亦受唐蛊惑拥唐回滇。

在滇军未出发之前，唐又发行了一批军用储蓄票，以弥军饷之不足（发饷两个月，半为现金，

半为储蓄票，此票就是从香港带来的)。原来总部为避免军民纠纷计，虽已下令，此票仅限于滇境内使用，桂境不准通行，但仍有一些不肖官兵不听约束，持票向商民强购物资。纪律败坏，闹得鸡犬不宁。于是民愤积不能平，土匪乘之，遂演成怀远之变。以林俊廷为首的广西自治军，此时散处怀远附近者人数原不甚多，但侦知此种军民矛盾情况后，乃暗中煽惑乡民对滇军来一次规模空前之伏击。四周乡民怨莫能伸。不论男女老幼均持刀矛扁担为武器，参加这次伏击运动。于壬戌年元旦后两日，在怀远西南三面设伏。李友勋，郑开文等因尚未进入滇境，以为离敌尚远，警戒疏忽。且怀远的地形又极利于包围歼灭(此地西端数百米是高山，东端复有一较大河流，东西仅为一条大街，有两个出入口，而城围坚固，又无法疏散和展开)，故林俊廷一举，便将滇军主力歼灭尽净。李友勋及其妻李本兰与郑开文等，均遇伏丧命。生还者仅有李友勋的一个川籍马夫，负其四岁稚子乘马突围猛冲而出。该马夫身中七弹，已成血人，然尚能忍痛赶来河池。胡瑛仅以身免，狼狈西逃，至河池以西始追上唐的总部。按唐此次行军部署，先头是龙云所部，其次乃胡若愚所部。唐和总部在中间，殿后是李友勋、郑开文、胡瑛等部。先头部队于除夕前两日由宜山陆续出发，行军时势如长蛇，宿营时连营百里。如不发生空隙，则遇变尚可互相支持。但不幸的是唐过于迷信，因为取旗开得胜之义，临时要赶至得胜关过年，故招来损兵折将之祸，此亦天命也。唐得悉郑、李殉难噩耗后，掩面大哭，泣不可抑，寝馈未安者，十有余日。盖未交锋已先损大将，实力锐减，唐、顾兵力对比，唐由优势又变为劣势，入滇能否如愿以偿尚是问题。唐衷心之痛苦，及对前途之顾虑是可以想象的。

幸而以后顺利进入滇省的广南，自宜山出发以来，军行已有廿余日。在此稍停。搜集情报，然后仍令龙云及胡若愚分向昆明挺进。除在江那与顾军小有接触外，一路未遇顾军有力之抵抗。此时唐预先派人联系妥当的李选廷、吴学显等又先后率部起事，亦向昆明分进合击。顾品珍在四面楚歌之境，然尚企图作困兽之斗，将省政交给罗佩金，军政交给金汉鼎代理，顾亲自督率所部拟与唐军一决雌雄。当顾军在天星关甫与唐军接触时，顾品珍忽被吴学显先遣部队狙击毙命。于是顾军指挥失统，士无斗志，乃不战自溃。其残部杨希闵、蒋光亮、范石生，杨蓁，杨池生，杨如轩等乃东窜黔桂边境。迨龙云首先进入昆明时，金汉鼎、罗佩金均已畏罪潜逃。罗佩金走至昆明以北的嵩明时亦被打死，至此，滇省乃告底定。唐重握滇省政权，对这次回滇将士，大加升赏(无论官兵均晋升一级)。并将龙云、胡若愚、李选廷、吴学显等部队从新改编为四个军，升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为军长，吴学显为挺进军司令。对于其他文武干部，各予以恰如其分之升迁。如擢王九龄为财政厅长，李永和为军需局长，高向春为河口边防督办，寥家法为滇越铁路警务处长，白小松为烟酒专卖局长，符昭骞为少校参谋，以示奖励。<sup>[8]</sup>

符昭骞的回忆录有多处绕不开的疑点，发表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三集，亲历者吴厚安的文章，便有对符昭骞着文《唐继尧回滇讨伐顾品珍亲历记》的订正。作者吴厚安，其时接替胡瑛任黔军第五旅旅长(即援桂黔军第五路军长)，是送别胡瑛离开柳州时的亲历者，对胡瑛、李友勋、郑开文在柳州至怀远的情况有所披露，吴先生称：

……《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符昭骞写的《唐继尧回滇讨伐顾品珍亲历记》一文中的第三节最后一段(140页)提到“滇黔联军援桂第五路司令胡瑛……受唐蛊惑拥唐回滇”一事，与

历史事实不符。1921年，胡瑛奉孙中山先生任命为援桂黔军第五路司令（当时无滇黔联军这个番号）时，我和陆荫辑、刘端裳等是第五路的第一、二、三纵队的纵队长，是胡的直接部属。我们相处多年，了解他是中国同盟会的会员。记得在1921年冬，胡奉孙中山先生命到香港迎唐继尧回桂参加北伐，胡是积极主张唐去桂林随孙先生北伐的，而且他是极端反对唐回滇的。他也不曾想过率部随唐返滇，后因谷正伦派在桂林，向孙先生说胡企图拥唐回滇，而孙先生又有些相信，胡感到受了委屈，愤然辞职。随后我被提升为旅长（援桂黔军第五路原是第三混成旅改编的）。当时我曾坦然地劝胡说：“我们还是拥护您当司令，并希望您即时率部返黔。”胡回答说：“这样不好，孙先生知道会通缉我的。”语态很严肃，给了我深刻的影响，后来我还派了一营武装兵由柳州护送他经宜山回黔。他到贵州之后，因为黔局发生变化，又感到自己是云南人，且思乡心切，就返回云南去了。

又该文第三节第四段说“第三日宿江口圩。船抵江口圩时，值黔军团长谷正伦正驻此地列队相迎，并备有精美的晚餐三桌，坚挽唐等上岸赴宴”（139页），亦非事实。查谷正伦早在援桂之前（1919年）就是黔军第二混成旅旅长，1921年他奉孙先生任命为援桂黔军第四路司令。当唐继尧经过江口圩时，谷在桂林，并不在江口圩，更非什么团长驻在该地。我们的部队和唐继尧一路由浔州西上柳州，中途亦未见过谷正伦。又该文第四节第四段提到唐之行军部署的殿后是李友勋、郑开文、胡瑛等部（141页），亦与事实不符。查李、郑虽是滇军老将，但那时他们已老病不堪，手下并未掌握部队，未能随唐同行。他们是在唐继尧离开柳州后约一周左右，为行路安全起见，才随同派送胡瑛的武装部队起程。我送他们渡到柳江南岸时，李、郑说想平安到黔之后再赴云南。不幸他们在宜山途中，均被广西土匪所击毙了。<sup>[9]</sup>

对怀远夜袭事件的发生、演变，符昭骞不是亲历者，自有不能自圆其说的瑕疵。疑点一，时间不对。符昭骞回忆怀远事件发生的时间是“于壬戌年元旦后两日”。据现存唐继尧《壬戌元日在柳州步郑参赞韵》诗词提供的信息：1922年元旦，唐继尧与郑参赞在柳州城吟诗作赋，毋庸置疑，郑参赞就是郑开文。另有，1922年1月5日，唐继尧致孙中山等电：“兹经溯江来柳，暂于该处设置总司令部，并赴各地慰问诸军，力加整顿，期随诸公之鞭弭，共策国事之进行。”<sup>[10]</sup>上述诗词、电文可证郑开文等人1922年元旦时还在柳州，以当时交通情况计，2-3天内赶到怀远镇是不可能的。

符昭骞回忆文章有“生还者仅有李友勋的一个川籍马夫，负其四岁稚子乘马突围猛冲而出。该马夫身中七弹，已成血人，然尚能忍痛赶来河池。胡瑛仅以身免，狼狈西逃，至河池以西始追上唐的总部”一说，提到唐继尧在此时段曾夜宿河池。笔者曾往返广西数十次，查得唐继尧毕生在广西河池州城仅“一宿”，时间是1922年2月12日夜至2月13日晨。并且，时任广西陆军第一师师长刘震寰在2月12日夜，拜见了唐继尧本人。2月13日，广西省长马君武致电孙中山、陈炯明，转达了刘震寰的急电内容，并请示怎样处置唐继尧返滇的问题。广西省长马君武致孙中山、陈炯明电：（1922年2月13日）

顷接刘师长震寰自河池州城急电，称唐莫赓率同滇军五千余人到河池，经震寰拜谒，并商请派兵助剿林俊廷溃兵。唐答称：现在急需回滇，筹备北伐，时机紧迫，不能相助等语。在河池仅

一宿即行，文日已到东兰、凤山一带，行程极为迅速。唐回滇已彰着，应如何对付。<sup>[11]</sup>

显然，此电文是广西陆军第一师师长刘震寰在河池驻地的军情报告，事关“唐回滇已彰着，应如何对付”的大局，刘必不敢轻漫拖沓。刘震寰、马君武向孙中山报告唐继尧率部的人数、行军方向、时间可视为实证。

疑点二，符昭鸾回忆文章有怀远镇伏击的参与者是“以林俊廷为首的广西自治军，此时散处怀远附近者人数原不甚多，但侦知此种军民矛盾情况后，乃暗中煽惑乡民对滇军来一次规模空前之伏击。四周乡民怨莫能伸。不论男女老幼均持刀矛扁担为武器，参加这次伏击运动”之说。能够说明2月前后在怀远镇附近的武装力量的存在情况，有广西陆军第一师师长刘震寰1922年1月30日，自河池州城行辕致孙中山捷报：

（衔略）本月元、筱、敬、艳、杓等日，我军攻占领下坳、龙头、罗城、登峒、河池等处，先后俘获敌人弁兵数百余名，夺得枪械及辎重无算（另单详报）。林俊廷、（马）福祥、蒙仁潜、陆云高、韩彩辉、关忠汉诸逆，各率残部，分窜南丹、思恩边界，尚在追击中。特闻。<sup>[12]</sup>

据此电文分析，自1922年1月13日起，广西陆军第一师师长刘震寰遵孙中山及陈炯明总司令命令，率部清剿下坳、罗城至河池一带的广西自治军林俊廷所部。刘部战事顺遂，于1月22日占领河池。

另有四川《东方杂志》十九卷5号时事日志载：1922年2月1日。林俊廷部败退南丹、思恩：桂军林俊廷部败于刘震寰部，退至南丹、思恩边界。

上述广西陆军第一师师长刘震寰的报告以及《东方杂志》的报道，表明1922年2月12日前十多天，广西自治军林俊廷部已溃退，远飏南丹、思恩等桂黔边界，出怀远镇至少有二百公里以远。

另据笔者研究发现，广西自治军林俊廷部退往南丹、思恩一线，恰于1922年2月12日致电孙中山先生，率部反正，接受广西省长马君武的招抚，故广西自治军林俊廷部在怀远镇设伏的可能性极低。林俊庭等致孙中山等电（1922年2月12日）：

桂林孙大总统钧鉴（余衔略）：

……第桂省粗安，而大局未定，西南政府行将出师北伐，吾辈军人职在护国，岂容各怀意见，以小忿而害大公，甘居人后，亟宜筹议北伐，俾与西南各省取一致行动。经派代表张家骧，赴邕与马省长稟商一切，当蒙许可。昨复奉马省长电开：业派军务处副长谭儒汉，带款一十五万元，偕张代表前来接济。俊庭等奉电之下，深以夙愿得偿，无任欢呼，当将广西自治军名目即日取消。现已集合桂省左右江，原有军队，编成二师，一致讨北，名曰广西北伐军第一、第二两师，暂分扎于黔桂边界，听候驱策。并由各将领公推卢总司令焘，为广西北伐军总司令，特派代表往（往）黔，欢迎来桂主持一切。于卢总司令未到任以前，暂由俊庭权为节制。

合电陈请，仰恳大总统俯赐任命，并希护法诸公一致赞同。俾桂省得竟护法之勋，俊庭初衷获遂，是不特桂省之幸，亦西南之幸也。临电迫切，伏候电示祇遵。前广西自治军总司令林俊庭率各将领同呈叩。文。印。<sup>[13]</sup>

再者，如符先生所言：“滇军在宜山及其近郊集结者共约一万两千人左右。除李友勋、龙云、胡若愚三部以外，尚有滇黔联军援桂第五路司令胡瑛所部在内，胡瑛原为黔军，但其本人乃滇省迤西人，亦受唐蛊惑拥唐回滇”。对于近在宜山县城附近的怀远镇（宜山至怀远十余公里）是否存在广西自治军林俊廷部和大股土匪，攸关滇军行军作战的重大隐患。以滇军一贯作风，步哨斥候（侦察）的探查预防是必不可少的程序，滇军断不可能糊涂至此，枉受广西自治军的袭击。另有资料显示，宜山县怀远镇是滇军二次回滇时的最后一个物资转运码头，先期由香港、梧州运来的军需物资沿西江水路运至怀远镇存放，早有滇军前线人员接应，设防。

至于滇军主力被全歼的原因：“于壬戌年元旦后两日，在怀远东西南三面设伏。李友勋，郑开文等因尚未进入滇境，以为离敌尚远，警戒疏忽。且怀远的地形又极利于包围歼灭（此地西端数百米是高山，东端复有一较大河流，东西仅为一条大街，有两个出入口，而城围坚固，又无法疏散和展开），故林俊廷一举，便将滇军主力歼灭尽净”的叙述，显然不符合当时情况。有证据表明，1922年1月24日前，梯团长龙云、奚冠南及所属孟友闻、蒋复初、马嘉麟、鲁琮支队均按唐继尧指令前往庆远（宜山）集中，嗣因李友勋突然发病，需在柳州医治。郑开文是在柳州等待杨益谦部归队，导致延后数天出发。最后由郑开文、李友勋、胡瑛三人结伴，经宜山到怀远追赶总部。怀远夜袭事件发生时，统属靖国联军第一军李有勋部前卫司令龙云部与唐继尧司令部已到达河池、东兰一带，李友勋、郑开文随行者仅有少数卫队，并非滇军主力。

对于郑开文、李友勋在怀远镇遭袭身亡的事件，还曾有李友勋部参谋长李某以亲历者身份向粤报记者的叙述，且刊登在当时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大的上海《申报》上，影响了后人对事件真相的探讨。

### 【相关链接】

#### 《李友勋遇害详记》

李友勋遇害，已见前报，昨有李之参谋长某君，脱险来粤，述李死事甚详。某君谓李司令为人沉毅，颇具远识。唐氏主张返滇，李司令以其妨碍北伐，不愿赞成。但以多年知遇，又不忍反对，是以各行其志。听唐到柳，已则决心取道贵州，转赴桂林。一月十二日，唐氏由柳赴庆远，将军队集中于该处。驻柳之兵，仅卫队一连，及胡瑛二连。一月二十二日，李司令等预备离柳，二十六日抵庆远。唐氏已于前一日率队前途。该城被张之纲股匪包围，准备来攻。李司令以兵力单薄，恐为所乘，即于二十七日早六时拔队离庆。沿途为匪追击，行至独山墟，始将土匪击退。午后四时抵怀远镇。因官兵疲困不堪，即在该处扎营。据土人报告，附近无匪，故戒备松懈。不料该处商民因唐氏曾提款二千元，恨滇军入骨，密令商团联合土匪，准备袭击。二十八日早七时，刚欲出发，四面八方，均被土匪围住。胡瑛率兵二连冲锋而出，李司令与子等率一连断后。经过之处，曲折甚多，无异鸟道羊肠，弹如雨下。郑开文首先中弹而亡。李司令见官兵死亡枕藉，甚为愤激，即拔手枪自戕，登时毙命。其夫人亦中弹身亡。子等见李司令已死，冒弹而奔，抵河池时，查点人数，计五十余员。得活命者，仅聂参议、卢参谋、范副官及予四人。兵士一连，仅余二十二人。胡瑛二连，仅余百人左右。李司令有一四岁公子，得一轿夫由险地挈至前方，交李司令介弟友仁，此亦不幸中之大幸也。查唐氏号称十支队；人数不上五千。李部居大半。在庆远誓

师日，已有不愿返滇表示。今闻李司令之死耗，想该部亦必不战而瓦解矣。<sup>[14]</sup>

李参谋长这段话述及怀远夜袭事件的背景，且多自身经历的细节，理应注意其中蕴含的逻辑。其一，作为李司令的参谋长，对于行军打仗的作业应该有十分清晰的逻辑，该部“李司令以兵力单薄，恐为所乘，即于二十七日早六时拔队离庆。沿途为匪追击，行至独山墟，始将土匪击退。午后四时抵怀远镇。因官兵疲困不堪，即在该处扎营”。即27日早6点，拔队离庆远（今宜山），中间有小股土匪骚扰，下午4点抵怀远镇，行军时间近10小时，致使官兵疲困不堪，即在该处扎营。笔者数次到达宜山县（今宜州市）、怀远镇实地调查。现实情况是，庆远（今宜州市）至怀远镇的两城间距约20公里，为山谷间平缓地形，沿龙江岸边行军，无高耸山峰要攀爬，无大江大河需舟载泅渡。可能短时有小股土匪骚扰，但以擅长山地作战著称的滇军来说，这10小时行军20多公里的说法，无论如何都是站不住脚的。

其二，其时怀远镇附近不可能有作战能力如此强悍的大股土匪存在，面对滇军三个连的正规军，还能围追堵截，如此从容应对，这也是不现实的。即便有小股土匪，其并无政治目的或受某方指令，与滇军死命相搏并非必要。

其三，时间上还是有出入。其时，坐镇于柳州西北部长安镇（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长安镇）的滇军北伐总司令朱培德，他离庆远、怀远最近，可能是第一时间得知怀远夜袭事件之人。朱培德等人于1922年2月21日发往桂林大本营孙中山总统的电文内容，就与此事件相关。滇黔赣将领朱培德等致孙中山等电（1922年2月21日）：

万急。桂林大总统钧鉴（余銜略）：

援桂联军第三路司令李公友勋，于本月某号由柳州随唐氏军间道出怀远，夜为匪袭被害。唐氏此次回滇，李公矢忠政府，唐因夺其军，公此行仅率卫队十余人，被戕于匪。……唐谋回滇益急，公惧误大局，婉谏之不听。唐氏至柳，首夺公之兵柄，公故得兵心，念唐为旧部，口无怨言。忽遭剧病，饮食俱废，唐竟弃之而去。黔军胡前旅长瑛由柳回黔，力挽之行，公不得已从之，遂及于难。……顾唐氏今已日暮途穷，良不足责，最可伤者，公不死于敌，而死于匪耳。除呈元首特予表彰外，谨以闻于诸公，若荷鉴其孤忠，赐以褒物，则李公不朽矣。

朱培德、谷正伦、彭程万、盛荣超、王天培、王均、张子口、刘其贤、胡思舜、吴传心、胡国秀、彭汉章、李明扬、赵德恒、赖世璜、陆荫楫同叩。马。印。<sup>[15]</sup>

朱培德等人的电文内容，大体是贴近实际情况的，与刘震寰、马君武的电文内容互为对照，即“怀远夜袭事件”发生的时间是2月12日夜而不是“李参谋长”所言“1月28日晨”。

此“李参谋长”不明庆远、怀远一带地形、地貌和滇军实际行军路线、事件发生的时间、因果关系，显然是杜撰的。尤其文章的最后段落，“查唐氏号称十支队，人数不上五千。李部居大半。在庆远誓师日，已有不愿返滇表示。今闻李司令之死耗，想该部亦必不战而瓦解矣”，显系其他政治派别幸灾乐祸地揶揄，亦不知返乡滇军的实际状况，故可信性特差。

笔者注意到朱培德电文有援桂黔军第四路司令谷正伦的署名，时在长安（融安），辅证吴厚安纠正之语：“查谷正伦早在援桂之前（1919年）就是黔军第二混成旅旅长，1921年他奉孙先生任命为援桂黔军第四路司令。当唐继尧经过江口圩时，谷在桂林，并不在江口圩，更非什么团长驻

在该地”为证，亦再次表明《唐继尧回滇讨伐顾品珍亲历记》所叙述“怀远事件”内容并非亲历或因时间久远而记忆有误。

### 【相关链接一】

李友勋等致孙中山等电（1922年1月2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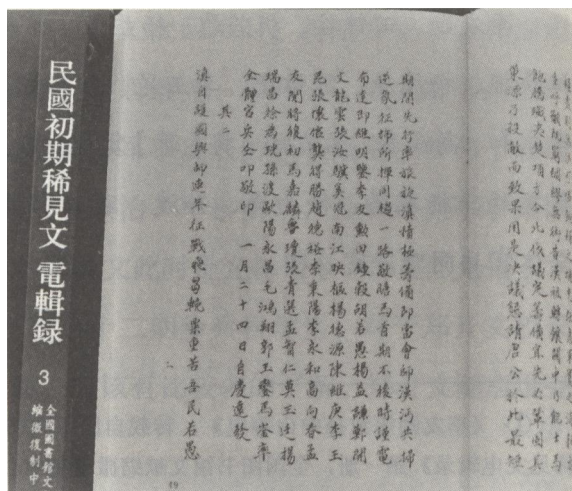
桂林孙大总统、李参谋部长、各军司令官、各师旅长，广州参众两院、各部总长、陈总司令，香山局送唐少川先生，上海吴莲伯、褚慧僧两先生，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各省议会、总司令、省长、各军长、各司令官、各指挥官、各旅长、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云南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三迤总会、各法团、军政各机关、各报馆、各局分送各师旅团营长、各司令官、道尹、各县知事、各督办、各行政委员、各厘金委员暨本省各界、全体人民公鉴：

民国肇造，祸乱迭乘，启处不宁，未遑建设，我西南力维正义，数载于兹。惟彼寇仇，久稽天讨，今国事日非，然（燃）眉势迫，允宜大张挾伐，一举澄清，用息纠纷，早筹国计。忆自滇军护国，屡奠邦基，际此颠危，益加奋发。比奉会泽联帅特命，飭速搜简军实，分道会师，职责所关，敢不努力。

顾自滇军援桂以来，艰苦备尝，驰驱数省，身经百战，天寒则挟纊不温，远戍穷荒，粮尽则无沙可唱，餉糈之补充既急，军实之消耗亦多，呼吁既穷，绸缪无术。昔汉祖转饷关中，乃能士马饱腾，歼夷楚项。方今北伐议定，筹备宜先，必巩固其策源，乃杀敌而致果。用是决议恳请唐公于此最短期间，先行率旅旋滇，积极筹备，即当会师汉、沔，共扫逆氛。征旆所挥，同趋一路，敬瞻马首，期不后时。谨电布达，即维明鉴。

李友勋、田钟谷、胡若愚、杨益谦、郑开文、龙云、张汝骥、奚冠南、江映枢、杨德源、陈维庚、李玉昆、张怀信、龚得胜、赵德裕、李秉阳、李永和、高向春、孟友闻、将【蒋】复初、马嘉麟、鲁琼、张青选、孟智仁、莫玉廷、杨瑞昌、徐为珖、孙渡、欧阳永昌、毛鸿翔、郭玉璠、马崑率全体官兵全叩。敬。印。

一月二十四日自庆远发<sup>[16]</sup>



有郑开文签名、发自广西庆远的靖国滇军回滇通电

### 【相关链接二】

李友勋、胡若愚等致孙中山等电：

（衔略）滇自护国兴师，连年争战，飞刍挽粟，重苦吾民。若愚等忝列戎行，未能早平国难，偃武修文，清夜抚躬，时深惭悚。去岁，以义切纓冠，率师援桂，驰驱千里，幸告成功。今桂事已就敉平，理让其自治，客军经年远戍，自宜各返原防。况比岁以来，内外多故，中原鼎沸，既须筹备以会师，政局丝棼，尤当共筹夫善后。同人等用是吁恳会泽联帅，率师西返，以资主持，而慰群情。缅维敬桑梓之义，时怀戒慎恐惧之心。祝民治以实行，早谋修养，顺潮流而建设，化洽祥和。谨电布达，伏维公鉴。

李友勋、田钟谷、胡若愚、杨益谦、郑开文、龙云、张汝骥、奚冠南、江映枢、杨德原、陈维庚、李玉昆、张怀信、龚得胜、赵德裕、李秉阳、李永和、高向春、孟友闻、蒋复初、马嘉麟、鲁琼、张青选、孟智仁、莫玉廷、杨瑞昌、徐为光、孙渡、欧阳永昌、毛鸿翔、郭玉奎、马崧率全体官兵同叩。宥。印。

二月二十六日自广南发<sup>[17]</sup>

## 第五节 郑开文在“二次回滇”时的任职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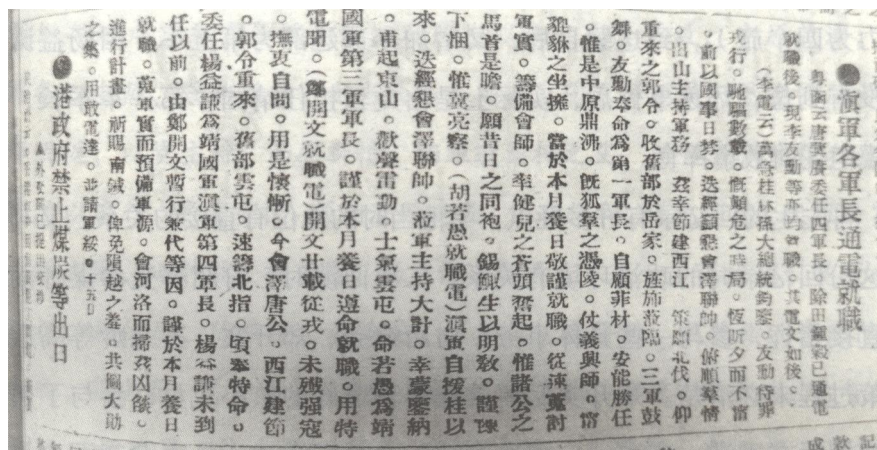
符昭骞回忆录中有：“军队编组原设三个军，军长内定为李友勋、胡若愚，郑开文（光杆无兵，仅有虚名）”之语，是否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以唐继尧 1922 年 1 月 21 日致孙中山电：“……前以出师事急，筹备宜先，特于柳州暂设总部，规划进行。并经巡赴各地，巡视诸军，宣扬德意，仰托威福，土气极为奋发。兹拟委任李友勋为第一军长、田钟谷为第二军长、胡若愚为第三军长、杨益谦为第四军长，除飭赶速筹备，分道会师外，谨电陈请，查核备案。”<sup>[18]</sup>以及，田钟谷、李友勋、胡若愚、郑开文（代理杨益谦第四军军长）于 1922 年 1 月 22 日同时发布《滇军军长通电就职》，皆表明，1 月 24 日在怀远誓师出发前，二次返滇的部队为四个军（实有兵力为四个旅），到达蒙自后，又增加李选廷部为第五军。因杨益谦始终没有到位，怀远事件后，实际上是由龙云担任靖国军第一军军长，张汝骥担任前敌指挥官。

符先生的回忆录有许多疑点，与他当时的地位有直接的关系，又与他写这份回忆录时的政治环境有关系。二次回滇时，符昭骞受参谋林丽山的直接指挥，参与一些具体事务，对唐继尧、郑开文、王九龄等高层的决策过程未必清楚。郑开文是唐继尧军事班底的核心成员，参与了唐继尧被拙后在香港、广东、广西所有政治、军事活动，是唐继尧军事集团最高级别的智囊、参赞，若认为郑开文此时是光杆司令，那显然是错了。

符昭骞是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十二期步兵科学生，对于郑开文校长 1916-1922 年间在滇军中的位置，应该有比较多的了解。郑开文随唐继尧离昆前，职务是靖国联军警卫军司令官，下辖四个警卫团，团长分别是龙云、奚冠南、张汝骥、李选廷。从《驻桂各军将领彭程万等致孙中山电》电文中，我们大体可以得知李友勋部的组成，即滇黔赣（援桂）联军第三路军：司令李友勋，下属两个梯团，梯团长龙云、奚冠南。共有四个支队，支队长分别是孟友闻、蒋复初、马嘉麟、鲁琼等，在 1921 年前均属靖国联军警卫军下属的团、营长，直接领导便是警卫军司令官郑开文，在

此特殊时期，旧属亲谊的关系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纽带作用。

1922年1月22日，李友勋、田钟谷、胡若愚、郑开文（代理杨益谦第四军军长）分别委任为靖国联军第一至第四军军长，有田钟谷、李友勋、胡若愚、郑开文等人在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1月23日）发表的《滇军军长通电就职》佐证。《郑开文军长就职电》曰：



《郑开文代理靖国军第四军长通电就职》（上海市图书馆史料，《民国日报》影印件）

开文廿载从戎，未歼强寇，抚衷自问，用是怀惭。今会泽唐公，西江建节，郭令重来，旧部云屯，速筹北指。顷奉特命，委任杨益谦为靖国军滇军第四军军长。杨益谦未到任以前，由郑开文暂行兼代等因。谨于本月养日（22日）就职，搜军实而预备军源，会河洛而扫兹凶焰。进行计划，祈赐南针，避免陨越之羞，共图大勋之集。用敢电达，并请军绥。<sup>[19]</sup>

以《民国初期稀见文电辑录》记载：1922年1月24日，李友勋等32人领衔自庆远发出“靖国联军全体官兵致西南各省通电”；1922年2月25日，胡若愚等人领衔自广南发出“靖国联军全体官兵致西南各省通电”（其二）；1922年3月9日，胡若愚等人领衔自开化（文山）发出“靖国联军全体官兵致西南各省通电”（其三）；1922年3月10日，胡若愚等人领衔自马塘发出“靖国联军全体官兵致西南各省通电”（其四），1922年3月19日，田钟谷领衔签发的自云南蒙自发出“靖国军致省内同胞电”等文电，均有郑开文的署名。

特别注意到1922年3月19日，田钟谷等人自蒙自发出“靖国军致省内同胞电”（其四），其中郑开文署名为“代理第一军军长郑开文”，<sup>[20]</sup>可能是由于第一军军长李友勋阵亡消息已被对方知悉，故以郑开文的名义代理第一军，实际上是前敌司令龙云兼任第一军军长。

从返滇部队的编制变化中，郑开文初以“暂行兼代”第四军军长，后又“代理第一军军长”，可以看出郑开文此时的实际影响和象征性作用都远远超出其他军、师长之列，亦不是一句“光杆司令”可包括的。

郑开文于2月12日夜遭土匪伏击而亡，两个月后，唐继尧返滇成功，才对外界宣布郑开文阵亡的讯息。究其缘由，当时唐继尧考虑到，返滇部队由于各方面的牵制，被朱培德拉走了近半数军力，出师未捷先损两员大将，人数骤减，士气颓废，对返滇的前景都非常沮丧。唐继尧为稳定军心之用，秘不发丧，严密封锁消息，造成郑开文仍然在指挥作战的假象。直至1922年3月19日，唐继尧所部进入蒙自，郑开文仍以“靖国军滇军第一军代理军长”的名义发表电文，让外界都以为郑开文仍然在和他们共同作战，其实际指挥者是前敌司令龙云兼任第一军军长。可能还有

一个原因，此时返滇的所有高级将领中，唯有郑开文与唐继尧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郑开文为人清正廉明，能征善战，使对方非常忌憚其才干。唐继尧是深受传统文化熏染的人，晓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若连唯一的士官生同学都牺牲了，观瞻上、道义上都很难看，甚至会对手制造一个合法性的议题。由此而来，不公布郑开文牺牲的消息，无疑可以最大程度震慑对手，占据道德制高点，演出了一段现代版的诸葛亮去世吓退司马懿的故事。

综合上述各方面情况、特别是两位“怀远事件”亲历者叙述的情况以及刘震寰、马君武、朱培德、林俊庭等相关人员在1922年2月12日前后所发电文的内容，并阅近年来先后问世的《广西柳州县志》《宜山县志》等相关内容，加以笔者数次在庆远（今宜州）、罗城、长安（今融安县长安镇）、凌云（原泗城）、怀远、环江、河池（又名金城江）、南丹、东兰、凤山、百色一带调查的情况来分析，大致可以有如下概况：怀远事件发生的时间是1922年2月12日夜间，袭击者为隐藏在怀远镇一带的土匪和部分被击溃的广西自治军游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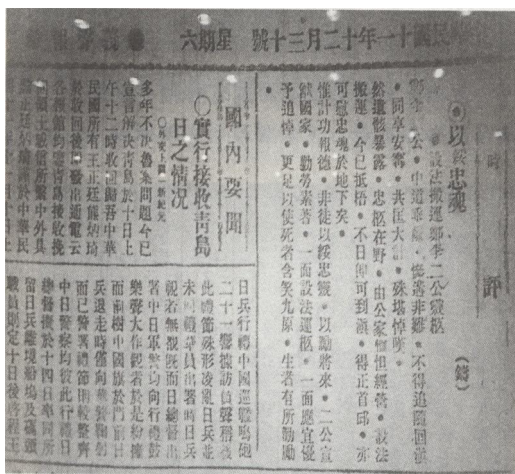
## 第六节 最后的漫漫回滇路

郑氏家族最隐秘的事情，莫过于郑开文罹难后的安葬以及棺槨回迁昆明的过程。据柳州县志记载，郑开文、李友勋遗体的殓葬是刘震寰主持完成的。刘与郑开文在广东有同事之谊，刘震寰部的一众军官曾是南宁陆军讲武堂的学生，所以，对曾任南宁陆军讲武堂校长的郑开文予以最后的礼仪，采购了当地最好的棺木。为日后的保存、运输考虑，采用了棺槨结构，内棺是檀木的，槨棺是水杉木，封存的技术也非常精细，这在战争时期非常不容易。

1922年12月30日，《义声报》发表了一篇时事评论：

《以绥忠魂，设法搬运郑李二公灵柩》

郑李二公中道乖离，惨遭非难，不得追随回滇，同享安宁，共匡大计，殊堪悼叹。然遗骸暴露，忠枢在野，由公家恻怛经营，设法搬运，今已抵梧，不日到滇。得正首邱，亦可慰忠魂于地下矣。惟计功报德，非徒以绥忠魂，以励将来。二公宣猷国家，勤劳素着。一面设法运柩，一面应义优予追悼，更足以使死者含笑九泉，生者有所劝励。（作者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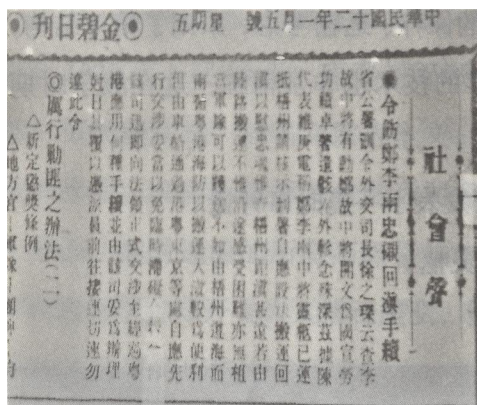


“以绥忠魂”之云南《义声报》时评《义声报》1922年12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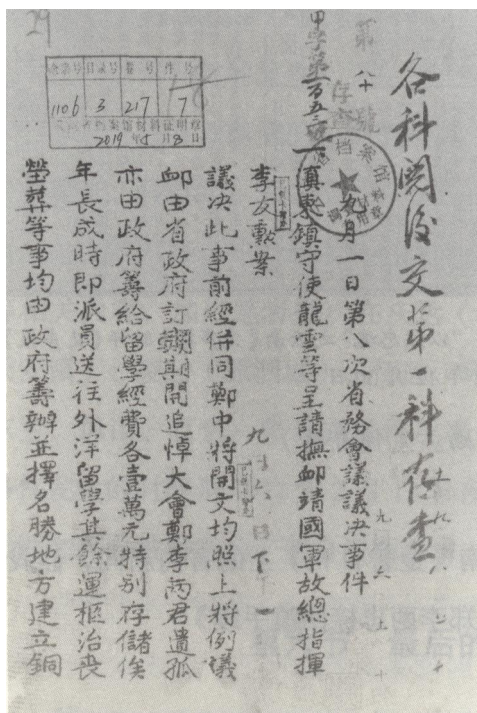
一则发表在1923年1月5日云南《金碧日刊》上的省内新闻，让我们知道了郑开文的身后事。

《令妥办郑李两忠柩回滇手续》：

省公署训令外交司长徐之琛云。查郑故中将开文、李故中将友勋为国宣劳，功绩卓著，遗骸在外，轶念殊深。兹据陈代表维庚电称，郑李两中将灵柩已运抵梧州，请核示到署自应设祭奠，搬运回滇，以慰忠魂。惟查梧州距滇甚远，若由陆路搬运，不惟沿途感受困难，亦无相当军队可以护送，不如由梧州遵海（道）而南，循粤港海防以搬运入滇较为便利。但由车船通过港粤东京（湾）等处，自应先行交涉妥当，以免临时滞碍。合行令仰该司迅即向法领事正式交涉至经过粤港应用何种手续，并由该司妥为办理。克日据复，以凭派员前往接运，切速勿违此令。<sup>[21]</sup>



将郑开文的灵柩运回滇省的相关报道（云南省图书馆史料，《金碧日刊》缩微胶片）



郑开文以上将军衔例议恤的省务会议记录（云南省档案馆档案）

不知何故，此后数月，关于郑李二公的灵柩搬运回滇的消息，就此像断了线的风筝，没有了踪迹。正在以为再无后续消息之时，《金碧日刊》又登载了一条新闻报道：1923年5月30日，郑李二公的棺槨运抵昆明大东寺。

1922年底从广西梧州起运的棺槨，历经半年之久，才运抵昆明，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笔者

曾多方追寻，得有下列信息：云南省政府派遣陈维庚、郑开宇（郑开文的五弟）负责搬运灵柩回滇。在广西怀远设祭后，搬上木船启运，沿西江、珠江水道至梧州、广州，再转海轮遵海道而南，过琼州海峡、东京湾（今北部湾）至越南海防港口。因棺槨过于沉重，海防市港口竟然没有可以承载棺槨的运输车辆，致使滞碍数月。最后由郑开宇召集民工，用圆木、滑轮承载滚动的方法，硬是以一天推进数百米的速度，耗时百余天，才将棺槨运至滇越铁路车站，最终运抵昆明大东寺。

家族老人回忆说“郑开文棺槨置于祠堂，省城文武百官，士绅商学各界，隆重追悼达七天之久”，而记录祭奠、追悼内容的挽幛诗联均不见于世。

郑开文安葬于昆明关上，享年 47 岁。

- 
- [1] 《唐莫赓实行度督电》，《民国日报》1920年6月7日登载。（上海市图书馆史料，影印件）
- [2] 转载自《郑司令整顿警卫军之训词》，《义声报》1920年9月24日。（《义声报》缩微胶片）
- [3] 转载自随军记者的通讯《自省会至马龙之纪事》，云南《义声报》1920年11月16日。
- [4] 1920年11月16日起，云南《义声报》连载随军记者的通讯《自省会至马龙之纪事》。
- [5] 《令各队来往公文之毋得省略及改值星为值周文》，载于《义声报》1920年11月16日，第5页。（云南省图书馆史料，《义声报》缩微胶片）
- [6] 《令各队来往公文之毋得省略及改值星为值周文》，载于《义声报》1920年11月16日，第5页。（云南省图书馆史料，《义声报》缩微胶片）
- [7] 李世沛著《唐继尧诗详注通释》，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第379页。
- [8] 符昭骞撰《唐继尧回滇讨伐顾品珍亲历记》，转载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
- [9] 吴厚安撰《对符昭骞着文“唐继尧回滇讨伐顾品珍亲历记”的订正》，（贵州省人委参事室供稿）转载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3-44辑，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第269-270页。
- [10] 《唐莫赓在柳就总司令职》，转载自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2月15日。（上海市图书馆史料，《民国日报》影印件）
- [11] 《唐继尧最近行踪》，长沙《大公报》1922年2月27日。（湖南省图书馆史料，长沙《大公报》影印件）
- [12] 《刘震寰致孙中山等电》，转载自桑兵主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第210-211页。
- [13] 《桂系遗孽已就抚》，《民国日报》1922年2月14日。（上海市图书馆史料，影印件）
- [14] 《李友勋遇害详记》，上海《申报》1920年2月10日。（上海市图书馆史料，《申报》影印件）
- [15] 《滇黔赣将领请表彰李友勋》，上海《时报》1922年3月14日，转载自桑兵主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第542-544页。
- [16] 《李友勋等致孙中山等电》，转载自国家图书馆藏历史档案文献丛刊《民国初期稀见文电辑录》第一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年4月，第47-49页。
- [17] 《李友勋、胡若愚等致孙中山等电》，转载自国家图书馆藏历史档案文献丛刊《民国初期稀见文电辑录》第一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年4月，第49-50页。
- [18] 《唐莫赓在柳就总司令职》，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2月15日，转载自桑兵主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第202页。
- [19] 《郑开文军长就职电》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1月23日。（上海市图书馆史料，影印件）
- [20] 《田钟谷等人致孙中山等电》，转载自国家图书馆藏历史档案文献丛刊《民国初期稀见文电辑录》第一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年4月，第69-71页。
- [21] 《令饬郑李两忠棕回滇手续》，云南《金碧日报》，1923年1月5日。（云南省图书馆史料，《金碧日报》缩微胶片）